
理论与应用 ● ● ● ● ●

谈法国“新系统论符号学”

怀 宇

摘 要: 本文结合作者的一位学生在法国攻读语言学博士期间投递的一篇介绍《聊斋志异》语言学表现的论文的经历, 介绍法国“新系统论符号学”目前的发展状况。作者最后对法国和我国符号学的研究现状发表了个人看法。

关键词: 新系统论符号学, 叙述论符号学, 索绪尔, 格雷马斯

The French “Nouvelle Sémiologie”

Huai Yu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current state and development of “new systemic semiotics” in France, drawing on the experience of a paper on the linguistic features of *Liaozhai Zhiyi* submitted by one of the author’s former students during her doctoral studies in linguistics in France. The article concludes with the author’s reflections on the current state of semiotic research in France and China.

Keywords: new systemic semiotics, narrative semiotics, Saussure, Greimas

DOI: 10.13760/b.cnki.sam.202601014

一、“新系统论符号学”概念的跃出

法国符号学的发展历程, 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两个符号学名称先后的接

替使用，最初人们使用的是“*sémiologie*”一词，大约在1969年之后，人们逐渐接受和使用了“*sémiotique*”。这两个名词代表着法国符号学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和两种方法论。前一个名称是从索绪尔开始使用的，直到20世纪50—60年代随着列维-斯特劳斯、拉康、福柯和罗兰·巴特等人的使用达到最大影响，它很早就汉语中被翻译成“符号学”。后一个名称是从格雷马斯开始使用的，从英语中借用过来，格雷马斯的初衷是表明与前者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有别，但并不与该词在英语中的表意完全相同。在60年代后期，甚至70年代初期，这两个名称同时存在，而且前一个名称使用更广。国际符号学学会（AIS或IAS）1969年成立时采用的名称是后者，但其用意是涵盖世界各国也包括法国在这两个名称之下的各种符号学研究，当然其汉语译名也只能是“符号学”。不过，后一个名称在法国逐渐地被理解为以格雷马斯为代表的符号学研究。现在，人们习惯于将第一个名称理解为早期的“系统论符号学”，其研究对象为符号的性质、分类及符号间的各种修辞关系；将第二个名称理解为“叙述论符号学”，其研究对象为“在符号之下”（*sous les signes*）包括叙述句法、行为者模式、模态和激情等的结构关系，并且这种研究已经成为当今法国符号学研究的主流。现在，如果赴法国进行符号学方面的交流，请你在对方只谈论“叙述论符号学”和格雷马斯，甚至连罗兰·巴特的名字也丝毫不会提及时不要表现出惊讶，你会产生“*sémiologie*”早已过时和相关代表人物早已被遗忘的感觉。

就笔者所见，在法国以“*sémiologie*”为名称的最后出版物，是1992年由纳唐出版社（Éditions Nathan）出版的《戏剧符号学》（*Sémiologie du théâtre*），作者是科乌赞（Tadeusz Kowzan，1922—2010），他的祖籍为波兰，曾于1964—1968年作为波兰社会科学院学者到法国从事专项研究工作，后来于1972年正式定居法国，先是执教于里昂第二大学，1975年后在冈城（Caen）大学任教直至退休（在法国叫“荣退”）。该书作者在书中承认，他从一开始研究戏剧符号学就遇到了是采用索绪尔传统的“*sémiologie*”还是采用皮尔斯传统的“*sémiotique*”来定名他自己的研究这一难题，因为当时正处于格雷马斯的“叙述论符号学”影响力刚刚超过“系统论符号学”的阶段，他曾大声疾呼：“系统论符号学死亡了，符号死亡了。”但是他仍采用“*sémiologie*”来定名他的教学和这一著作，并在喊出“符号死亡了”之后，又呼出“符号万岁”的口号。他比较接受的做法是将“系统论符号学”与“叙述论符号学”放在一起定名涉及符号各个方面的研究，“保留*sémiotique*用于有关符号的理论或一般科学，把*sémiologie*用于这种理论对某

一领域的研究” (Kowzan, 1992, pp. 5 - 7)。这种主张与叶尔姆斯列夫早先提出的对于符号学研究各个方面使用的名称基本一致。不过, 他的呼吁似乎没有起到多大作用, 在他的《戏剧符号学》之后, 在法国似乎就没有再见到以 “sémiologie” 为书名的书籍。

那么, 由系统论符号学开创的对于符号本身各个方面的研究从此就停止了吗? 这是我曾有过的疑问, 因为在我看来系统论符号学还是有一定根据和用处的。但是, 依据下面的情况,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笔者的一位学生李梦一在她于巴黎索邦大学攻读博士期间, 曾经向法国著名期刊《语言学》 (*Linguistique*) (这是由法国大学出版社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编辑出版的很有影响的一份杂志) 投递过一篇文章, 介绍她对《聊斋志异》一书中涉及语言学方面的问题的研究, 文章法文题目为 “*Métamorphose du renard, études sémiotiques des contes de Pu Songling*” (中文译名为《蒲松龄故事的符号学研究之狐狸变形》)。她后来发微信告诉我 (她同意我公开她发给我的微信内容): “我投稿时收到的都是正面评价, 而且是第一次审稿就确认接受, 审稿人说我写的内容很有趣、很细腻, 就是应用的都是格雷马斯和丰塔尼耶的理论, 有些单一, 建议我加入一些系统论符号学家例如安娜 - 玛丽·乌德比娜 - 格拉沃 (Anne-Marie Houdebine-Gravaud, 1940—2016) 的观点, 我就把最后丰塔尼耶的具体分析换成了这位学者的社会符号学的分析。” 文章最终获得了接受, 发表在该杂志 2023 年第 1 期第 171 - 187 页。我的理解是, 有关 sémiologie 的研究仍在继续, 尽管已经不是主流, 我们作为外国读者, 很难及时获得应有资料。于是我便请李梦一向我提供她所参考的安娜 - 玛丽·乌德比娜 - 格拉沃的文章, 我收到文章电子版之后发现, 该文就出自我自己有的一本由朗贝尔 - 吕卡斯 (Lambert-Lucas) 出版社于 2014 年出版的《符号学访谈》 (*Entretiens sémiotiques*)。从该书使用的 “sémiotique” 一词来看, 我一直理解为书中内容应该是对于叙述论符号学学者们的访谈, 此前, 我只是有选择地阅读过其中我熟悉的几位符号学家的访谈篇目, 而没有去关注所有的篇目, 自然也就漏读了对这位系统论符号学学者的访谈文章。这一次, 我先是认真地过目了该书 “绪论”, 随后阅读了相关文章。

“绪论” 开头就说, “这部著作汇集了从 2011 年 1 月到 2013 年 3 月对于多名享誉国际的符号学家 (sémioticiens) 的 22 篇访谈录” (Biglari, 2014, p. 7)。但是, 鉴于在国际上存在源于美国逻辑学家皮尔斯传统和源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传统的两种主要研究路径, 为了把范围缩小, “这部访谈录汇编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在 ‘巴黎符号学派’ (École de Paris) 名下进行的符号

学 (sémiotique) 研究, 不过, 其他声音也在此有所出现” (p. 8), 而“巴黎符号学派”则是由法国及欧洲的一些语言学家在格雷马斯理论影响之下形成的一个学派, 该学派坚持在语言学范围内研究符号学。于是我们便理解, 不论是巴黎符号学派还是“其他声音”, 这里所说的符号学便主要是依据语言学基础进行的研究, 虽然也会涉及所谓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新系统论符号学” (nouvelle sémiologie) 一词是在“绪论”部分的第 10 页上作为“叙述论符号学”聚合体即并列存在的内容之一被提到的, 我理解这里的“新”显然是针对过往的几十年间仍在继续且有所拓展的“系统论符号学”研究而言, 亦即巴黎符号学派之外的“其他声音”, 但“绪论”对其没有做进一步的说明, 我们只好通过阅读对安娜-玛丽·乌德比娜-格拉沃的访谈来探知一二。

二、安娜-玛丽·乌德比娜-格拉沃的系统论符号学理论

被收录到这部书中的文章, 在编排上采用了统一的模式: 先是受访者的出生年月日和出生地点, 后是所属单位或研究岗位, 再是研究领域及主要出版物和所发表文章, 在这些之后便是访谈内容。安娜-玛丽·乌德比娜-格拉沃退休前为巴黎第五大学 (后与巴黎第七大学合并, 现名为巴黎西岱大学 [Université de la Cité]) 语言学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是普通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系统论符号学 (sémiologie)、精神分析学、性别差异与自然语言等。她只在 2008 年出版过一本个人著作《〈肖阿〉的写作: 对于克罗德·朗兹曼影片的分析性解读》 (*L'Écriture de «Shoah»*)^①: *une lecture analytique du film et du livre de Claude Lanzman*), 由她担任主编合作出版过三部书, 另有 6 篇重要的文章列入。我们一时无法获取相关书籍和文章, 但对她的访谈肯定会告诉我们其基本主张。

安娜-玛丽·乌德比娜-格拉沃主要是围绕着“系统论符号学”和“迹象符号学” (sémiologie des indices) 两个方面来回答相关访谈提问的:

(1) 关于“系统论符号学”。她在回答“您为什么一般使用 sémiologie 这个术语而不使用 sémiotique”时说: “我忠实地使用 sémiologie 这个术语, 是为了表明我属于索绪尔和罗兰·巴特学派。对于索绪尔和罗兰·巴特的参照

^① 《肖阿》 (Shoah) 是朗兹曼 1985 年导演的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集中营的一部纪录片。

从一开始就主导着我的符号学研究，到现在已经 30 多年了。我知道，术语 ‘sémiotique’ 被人们普遍地使用，但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却不是这样。特别是，我从来没有在 sémiologie 的研究方面跟随着语言学研究发展的时髦。” (Biglari, 2014, p. 242) “返回巴特，返回索绪尔，我的参照是明确的，并且一再得到确定：他们是我为自己创立的 sémiologie 的两个奠基性顶级人物。” (p. 243) 关于 sémiotique 和 sémiologie 两个名称的使用，她主张“对于明确的对象，例如音位学（或称音系学）模式和语音学模式，我认为可以使用前者，而对于一般的科学对象来说，我认为可以使用后者” (p. 243)。显然，这与《戏剧符号学》一书作者科乌赞的主张并不一致。在回答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系统论符号学时她告诉我们，她是在阅读了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特别是在阅读了罗兰·巴特的《神话》(Mythologies, 1957)，并在巴黎第三大学接替克里斯蒂娜·勒鲁瓦 (Christine Leroy) 讲授 “sémiologie” 课程之后，决定将这一学科研究下去。她告诉我们，在讲授这一课程之初，她按照罗兰·巴特的做法，先是寻找文本与图像之间的固位 (ancrage) 关系或互补关系，以及寻找其外延内容和内涵内容；随后便是努力建立一种严格的理论来分析图像，为此，她制定了比罗兰·巴特更多的分析层级或层次：场景安排（即建立场景）、空间安排、色彩选择等，她当时在解读图像时特别注意援引语言学的概念，“为了使描述更为严格，而较少直觉，我提出了带有两个发音项的坐标图：纵坐标表明的是被分析的层级或层次的各种要素，横坐标表明的各种标准或各种聚合特征……这些被找出的特征按照它们的不在场 (-)、在场 (+) 或非相关性显示 (x) 来分类。对于图标的综合研究可以让我们在水平轴上找出语料的句法编码；而在与聚合轴相符的垂直平面上，我们在比较（使之对立）构成语料的每一种要素之特征数量的情况下，可以找出大部分不变要素” (p. 244)。她接着说，她先后在两所大学讲授 “sémiologie”，发现某些概念是非常复杂的，并因此精练了她的分析方法。她认为，sémiologie 比纯粹的语言学更叫人感兴趣，她可以用 sémiologie 来解释系统之概念，解释饭店午餐套餐菜谱中的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解释玛丽亚娜 (Marianne) 塑像上各种线条的汇聚特征以及整个系统动态的历时关系等，“于是，我从巴黎第三大学开始的对于 ‘符号系统’ 的这种旅行一直在延续，并得到深化，我从未放弃 sémiologie” (p. 246)。在谈到语言学与 sémiologie 的关系时，她说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方法和概念平面上，结构语言学（索绪尔，叶姆斯列夫），功能语言学（马丁内 [A. Martinet]、穆南 [G. Mounin]，皮耶托 [L. Prieto]），音位学（布拉格学

派)都是我基本的和经常的启发者。我从结构语言学方面借用了语料研究方法,从索绪尔方面借用了以系统论符号学为基础的系统概念、符号概念和任意性原理,我还借用了区别性关系、观点(在马丁内那里是相关性)、切分和对比替换方法,以及组合关系轴和聚合关系轴”(pp. 246-247)。

(2)关于“迹象符号学”(sémiologie des indices)。她认为,“迹象符号学的新颖之处,便是同时使用乍看有点矛盾的一些方法,这些方法一方面是描述性的和形式的,另一方面又是解释性的,它们明显地不是过于形式的,却不乏严格性。实际上,这也是一种说明性的 sémiologie。在这一点上,它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提出了有关意义的问题,因为这种符号学依靠的是迹象、迹象性能指和研究者的联想三个方面,当然,它是讲求一定方法的。这一点自然就构成了其相对于 sémiotique 的独特性”(p. 251)。在描述阶段,这种符号学并不关心所谓的意义,而是只关心意义的构成成分(即叶姆斯列夫说的内容之形式)和语言学上的符号要素,即迹象。在这第一阶段即所谓的系统分析阶段,亦即描述性和说明性阶段,迹象符号学的工作方法是形式的、内在的,几乎就像语言学的做法那样,它是结构的,是在寻找一种“语法”。这就需要在被研究的语料中找出各种运作规则,根据被分析对象(比如广告之造型的、空间的、色彩的和像似的要素,语言学平面上的句子类型、词汇要素和陈述活动成分等)在被分析层级上找出构成这一系统(编码或结构过程)的所有可能的单位,这种综合性的做法可以让我们找出大部分一致性要素,因此也就可以确定结构的类型,这种结构可以是刚性的、编码的或灵活的。这便是安娜-玛丽·乌德比娜-格拉沃所称的“结构化过程”(structuration)概念。

在描述阶段找出的要素即迹象,在说明阶段中会被分出等级(比如一致性、全面性等);这些迹象或迹象要素都是意义的承载者,它们组成“迹象能指”(signifiant indiciel),随后,这些迹象能指便被赋予意义,进入了迹象符号学的第二个阶段,即“解释性阶段”(phase interprétative)。在这个阶段,“这些迹象能指接受(或者分配给它们)支持它们的一些意义假设,然后将其固定为意义效果……迹象能指概念在解释阶段就被内涵能指或内涵成分所取代”(p. 252)。解释工作,即是意指活动^①的过程,它首先是内在的,

^① 意指活动(signifiante),是系统论符号学惯用的术语,列维-斯特劳斯、克里斯蒂娃等学者均使用这一概念,指的是“有所意味的特征(但不确定意义)”(Rey-Debove, 1979, p. 136);而叙述论符号学使用“signification”,指的是“意指”或“意指过程”,意义是确定的。

其所依靠的是核心语料的所有要素，并将其与组合关系语境和聚合关系语境结合起来，而在这之后，“我们求助于外在的支撑：不同文化间、不同话语间、不同图像间——宽泛地说就是各种文化间的参照，即离不开必需的文化参照和文化想象参照。此时所参照的要素便被称为外部解释者”（p. 253）。这些，无疑是对传统的系统论符号学在继承中的某种拓展。

安娜-玛丽·乌德比娜-格拉沃对于迹象符号学的介绍还有很多，举例细腻，也有深度，但限于篇幅本文就不再展开了。至此，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李梦一的文章对于安娜-玛丽·乌德比娜-格拉沃系统论符号学的援引内容，也许更能帮助我们了解其迹象符号学是怎么一回事。李梦一在参照了格雷马斯和丰塔尼耶的相关理论得出蒲松龄笔下的“狐狸精”身体可以成为符号学分析对象之后，指出狐狸精的身体具有两种功能：一种是审美功能，另一种是象征功能。审美功能表现为它再现了一个理想的女人的身体，象征功能表现为它创造了一种不同于一般女性的新的外在形象。外表上，它是一个女人和一个成精的狐狸组合而成的，两种角色轮流展现，呈现的是一种二元性。一方面它具有一种动物的自然特征，随着叙述者的意图而转换，另一方面它又具备一个社会的人的属性：“因此，展示意指活动的过程应该得到严格描述：解释性分析所依据的是迹象能指，以便产生意义；这种分析使用‘现成的象征物’，即进行描述的语言和研究者的联想，同时做出假设，即这些联想是由话语和文化强加给研究者的。”^①显然，李梦一在这里援引的安娜-玛丽·乌德比娜-格拉沃原话中所说的联想，就是对前文提到的其“迹象能指”和“求助于外在的支撑”的一种诠释。

三、弗朗索瓦·若斯特的系统论符号学理论

通过阅读书中每一篇访谈录开头部分的个人信息、研究领域及主要出版物，我发现还有一位系统论符号学主张者和坚持者，他便是弗朗索瓦·若斯特（François Jost, 1949—）。他是巴黎第三大学的教授，主攻“视听方面的系统论符号学和叙述学，从事电影和视听方面的研究”（Biglari, 2014, p. 271）。他出版了12部书，最早的一部面世于1979年（与他人合著），书名为《新电影与新系统论符号学》（*Nouveau cinéma, nouvelle sémiologie*）；最

^① 李梦一援引的安娜-玛丽·乌德比娜-格拉沃的文字，见于后者的文章《话语间性和像似间性作为对于解释性系统论符号学的解释》（Houdebine-Gravaud, 2009, pp. 371-388）。

近一部是2014年出版的，名为《电影名下的传播》（*Sous le cinéma, la communication*）。他在访谈中的回答主要围绕着以下两个方面：

（1）关于选用“*sémiologie*”而不是“*sémiotique*”的问题，他解释说，他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电影研究的，当时就觉得克里斯蒂安·梅斯（Christian Metz，另译克里斯蒂安·麦茨，1931—1993）开辟的电影符号学是他可以施展能力的领域。后来，当他与另一位合作者决定写一本关于电影符号学的书时，他发现他们无法完全认同梅斯，于是他们便采用了自己发明的“新系统论符号学”（*nouvelle sémiologie*）概念，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远离了格雷马斯。1972年，热奈特（G. Genette，1930—2018）的《形象Ⅲ》（*Figures III*，“叙事话语”是书中最重要的内容）让他着迷，他一头扎进了叙述学领域，决定注册热奈特的博士研究生。在那几年中，他了解到梅斯和热奈特都不很信任格雷马斯，而梅斯虽然曾在一段时间内担任过格雷马斯的助手，并且在其《符号学论集》（*Éssais sémiotiques*，1977）一书中使用“*sémiotique*”一词，但“实际上，我丝毫没有看出这与他先前主张系统论符号学时期有什么不同。今天，情况不同了，我的概念研究更多地参考了皮尔斯的符号学”（Biglari，2014，p. 272）。

在谈到热奈特对其影响时，他说：“不论是在我的智力思考领域，还是在我的写作过程中，热奈特对于我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会常常从热奈特那里学习到写作的东西，而这种东西，我在梅斯那里是学习不到的。除此之外，他还鼓励和帮助我在《诗学》（*Poétique*）上发表文章……对于我来说，是热奈特让我认识到叙事的重要性……也多亏了热奈特和他的《叙事话语》我才理解了‘意味着什么？’和‘讲述了什么？’，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这正是我发表在《交流》（*Communication*）第38期上有关电影陈述活动的文章的思考出发点。热奈特对我的作用就是让我区分开系统论符号学与叙述学。”（pp. 273 - 274）从此，他将系统论符号学用来理解意指问题，而用表达的叙述学来理解“如何讲述的？”和“理解电影叙事的必要时间范畴是什么？”等。

在回答如何看待电影符号学的现状和未来时，弗朗索瓦·若斯特告诉我们，梅斯的电影符号学是建立在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基础上的，符号的任意性、外延、内涵、词语与形象的对等是其重要概念，而正是由于梅斯更多地围绕着类比性或语言（*langue*）与言语活动（*langage*）之间的区别性，梅斯的《言语活动与电影》（*Langage et cinéma*，1971）一书并不是很成功。显然，梅斯是沿用了索绪尔的概念：语言是指语言规则，言语活动是语言和言语

(即对于语言规则的运用)的集合体。而他所在的这一代,电影符号学研究更关注有关陈述活动的语言学和有关电影文本的理论;现在,是电影叙述学盛行的时代,人们则更关心陈述活动或视角,这两点已经成为现时电影符号学的最重要方面。

关于语言学对电影符号学的贡献,他说,在电影符号学建立之初,语言学处于中心位置,是梅斯将电影言语活动与自然语言分离,并且言语活动的双重分节式衔接是其研究的主要内容。图像在拆分成可供形式研究和文本结构研究的点位之后,其数字化处理正是建立在一种双重分节衔接基础上的。他认为,源于语言学与现实之间的类比性(analogie)概念现时已经不是十分重要,而图像的指示特征(indicialité)更具有影响力,原因是这种指示特征比起与现实相似可以更好地划分图像和研究文献资料。

(2) 对于电视节目的研究。电影只是视听方面很小的一部分,他从1982年起在巴黎第三大学开始了电视节目的教学。国家视听研究院(Institut national de l'audiovisuel, INA)为研究者们提供了大量资料。从这时起他开始面对有关电视的许多问题。他先是致力研究总体上的大众传媒的特征,在他看来,研究工作已经不能局限于图像,而是要兼顾图像和声音即言语活动。电视可以播放一切,问题就在于如何为各种节目做出分类,如何理解分类对象之间的逻辑关系,于是他必须首先在体裁分类而不是在图像方面多做工作。随后他考虑,这些图像如何根据一种解释者(interprétant)被观众接受。正是从这时起他转向了皮尔斯关于解释者的符号学理论,在他看来,对电视节目的解释者的划分比起图像之间关系的确定更像是体裁分类。他认为,所有的电视节目都可以根据三种解释者来划分:真实世界解释者、虚构世界解释者和游戏世界解释者。这三种解释者可以依据皮尔斯的符号学加以确定:“第一种指向客体即我们所在的世界,第二种即虚构世界指向一种心理时间,至于第三种则指向它自己。”他紧接着说他在一次研讨会上接受了丰塔尼耶的提示,又很快将第三种解释者改称为“游戏世界的客体,即符号本身”(Biglari, 2014, p. 284)。他说,他对于电视的分析概念,均建立在所有的电视节目都具有这三种解释者的基础之上,它们是电视节目的特征之一。也许,我们在此对于皮尔斯的“解释者”概念有了更为明晰的理解,那便是“依据什么来做出解释”之意,弗朗索瓦·若斯特补充说,他在后来的一本关于电影符号学的小册子里,也使用了这三种解释者的概念。他还指出,这种特征并非电视所特有,它还适用于所有的传播领域。不过,对于解释者的选择却极大地取决于对节目体裁的使用和人们在电视传播机制中所占据的位置。

在回答系统论符号学对于传媒研究，特别是对于电影和电视研究有什么贡献时，他告诉了我们一种情况：在20世纪60—80年代有过公认的关于电影的系统论符号学，但是到了1983年，哲学家德勒兹（G. Deleuze, 1925—1995）以他的两本书《图像与时间》（*L'Image-temps*）和《图像与运动》（*L'Image-mouvement*）“闯入”了这个领域，而德勒兹所依赖的也是皮尔斯的模式，这就大大改变了人们此前所理解的系统论符号学。他认为，德勒兹在电影理论方面的介入打乱了系统论符号学已有的一种默认前提，即这种符号学是可以分析任何文本的，包括虚构电影、动画片等。德勒兹介入这一领域后，一切都变了：“他在他的两本书开头部分，明确地说他只对名著感兴趣，他只关心有名气的电影艺术家，却从未说明有名气的电影艺术家是什么情况。德勒兹带起了一群人形成了一股美学潮流……而在德勒兹之后，向着审美发展的电影理论有所收敛，直至只关注‘美’（Beau）的问题，再就是人们更看重电影作品。与此同时，一些电影艺术家却受到了漠视。”（Biglari, 2014, pp. 286 - 287）这里，虽然弗朗索瓦·若斯特对于德勒兹的评价流露出了一种负面的情绪，但他的话也印证了在传媒方面的系统论符号学所经历过的一个阶段。

四、结尾的话

一篇年轻博士投递出的文章的发表经历，重新引起了笔者对于系统论符号学的关注，笔者想就以下几个方面谈点个人的看法：

（1）系统论符号学继续存在着，因为上面提到的两位学者都说，他们退休前曾带过博士研究生，而且退休后也参与过一些博士生的答辩活动，这就告诉我们，在法国的大学教学和一些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对于系统论符号学的研究和应用仍在继续。笔者注意到，两位学者的研究内容还是有区别的：安娜-玛丽·乌德比娜-格拉沃基本上是在语言学范围之内进行社会文化方面的研究，而弗朗索瓦·若斯特则是依据系统论符号学基础理论和成果对电影和视听艺术进行属于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他的全部工作似乎就是在证明系统论符号学在非语言学类的其他社会科学领域里仍然富有生气。此外，我们还注意到，系统论符号学在后来的发展中（即“新系统论符号学”），也吸收了叙述论符号学和皮尔斯理论的部分概念和操作方法，其“新”也恰在此处。

（2）系统论符号学继续存在着，而且是在被赋予了一些新内容和新方法

之后继续存在着。不过，在《符号学访谈》所收录的对于 22 位学者的访谈中，系统论符号学研究者只有两位，这说明了叙述论符号学在法国符号学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事实，而叙述论符号学更是坚持语言学研究方向和方法的，所以符号学在法国属于语言科学教学之列。在此，我们必须顺带说一说法国的叙述学 (Narratologie) 或诗学 (Poétique) 的情况。首先，笔者认为，它们都属于符号学研究，因为它们最初都起源于结构语言学，都是对于“符号”这一特定对象的性质、种类和相互关系的一种研究，而且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它们的研究成果占据着法国甚至国际符号学研究的重要位置，我手中由国际符号学学会编辑并于 1971 年出版的英法双语版的《符号学论集》(英文 *Essays semiotics*, 法文 *Éssais sémiotiques*) 就是佐证，其中收录了德里达、克里斯蒂娃、洛特曼、吉罗 (Guiraud)、迪布瓦 (Dubois)、热奈特、梅斯、西比奥克、托多罗夫等人的文章，它们还都是系统论符号学方面 (包括叙述学) 的文章。只是，按照法国著名符号学家埃诺 (A. Hénault) 的说法，迪克罗 (O. Ducrot) 和托多罗夫在他们合作编写的《言语活动科学百科手册》(*Dictionnaire encyclopédique des sciences du langage*, 1972, 再版 7 次, 最近一次是 2022 年) 中明确表示，他们“不同意离开词语领域，并把他们对于言语活动 (langage) 的理解局限于‘自然语言’的狭窄和平庸的意义” (埃诺, 2019, p. 8) 上，这就等于是自动退出以语言学研究为基础的法国符号学领域，因此我们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出版的一些符号学汇编本中便没有再见到来自叙述学 (诗学) 方面的研究文章，因为叙述学或诗学变成了独立发展的学科。

(3) 笔者想顺便说明的是，格雷马斯的符号学理论从很早就主张“在符号之下”进行研究，意即研究更深层的“意蕴过程”，在格雷马斯理论影响之下形成的“巴黎符号学派”更是做出这样的表态：“一次就艾柯 (U. Eco) 的《不在场的结构》(*La structure absente*) 一书所做的访谈，开篇伊始就见到这样的定义：‘符号学是关于符号的科学。’《小罗贝尔词典》(*Petit Robert*) 在其第一版中也说是‘关于符号的一般理论’。对于巴黎符号学派来说，定义则是另外的。符号学计划在于建立一种有关意指过程的一般理论。在某些符号学研究看来，符号首先是一种可观察的对象；按照巴黎符号学派的观点，符号首先是一种已经被建构的对象。” (Coquet, 1982, p. 5) 也就是说“巴黎符号学派”已经不再关心符号本身，这便是《符号学访谈》一书中另外 20 位学者的基本情况。也许有人会问，国际符号学学会会刊《符号学》(*Semiotica*) 今天的情况如何呢？笔者有意浏览了该刊近两期 (2025 年总第

264 期和总第 265 期) 的目录, 认为所发文章多为兼容系统论内容的语用学 (pragmatique) 和叙述论符号学方面的文章, 也就是与语言学密切相关的文章。第 264 期全是英语文章, 其中有两篇还是我们中国学者写的文章, 其文章题目按字面可翻译为《多模态翻译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 回顾与展望》和《名词群形容化程度复杂性: 一种自信息测度法》; 第 265 期则是《神秘性与政治性专刊: “是” 与 “做” 之间的张力》, 全是法语文章, 其中就有格雷马斯过去的学生、现任国际符号学学会会长丰塔尼耶 (J. Fontanille) 以及法国著名符号学家贝特朗 (D. Bertrand)、博尔德龙 (J. - F. Bordron) 这些叙述论符号学大家的文章, 他们的文章译名分别是《神秘性、精神性和生态政治: 面对卡雅^①》《专刊总序》和《爱情与混乱》。

(4) 这里, 我还需要说明一点, 在《符号学访谈》中那些被访谈的著名叙述论符号学家, 也并非都是法国学者, 其中还有一名加拿大学者、一名阿根廷学者、一名意大利学者、一名比利时学者和一名芬兰学者, 我们在法国每两年召开一次的法国符号学学会大会上现在还可以见到巴西、美国等的一些学者。可见, 法国的叙述论符号学已经变成国际性的了。据悉, 法国符号学学会共有注册会员 100 余人 (自然包括系统论符号学家), 每一次法国符号学大会大约有来自多国的约 200 人参加, 每召开一次都会提前拟定一个新的主题, 以便大家准备与会发言或提交文稿, 李梦一在读博期间就曾多次参加这样的会议。笔者顺便在此通报一个信息: 最近和几位年轻学者应邀参与了法国利摩日大学符号学研究中心 (CeReS) 的埃法 (D. T. Effa) 教授和卢森堡大学著名符号学家克拉斯 - 布莱茨 (M. Colas-Blaise) 教授共同主编的《布卢姆斯伯里手册: 格雷马斯》(Bloomsbury Handbook of Greimas)^② 一书部分文章的撰写, 文章要用英文写成, 由总部设在伦敦的布卢姆斯伯里学术出版社 (Bloomsbury Academic) 出版, 我们提供的文章是《格雷马斯在中国的翻译、介绍和应用》《〈西游记〉的叙述程式》《贾平凹乡土小说中的传统与现代叙述符号学研究》和《失慎言说及其模态张力: 论〈儒林外史〉道德实验场中的 “欲为”》, 并且我们可以用汉语在国内发表这些文章。这不, 我们中国学者也参与了格雷马斯叙述论符号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应用。

(5) 最后一点是, 我对于我国符号学的研究现状近年来逐步形成了这样

① 根据文章的介绍, “卡雅” (Caia) 是神秘性与宗教性的结合体, 它是 “有生命的地球之圣象”。

② 据埃法教授介绍, 这是这家出版社的一套丛书, 已经出版的有《布卢姆斯伯里手册: 索绪尔》(Bloomsbury Handbook of Saussure)。

□ 符号与传媒 (32)

的看法：由于汉语不是曲折语 (langue flexionnelle)，而汉字是以表意为主的一种文字——索绪尔说汉字是“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 (1982, p. 51)，这种文字本身就是一种复杂的、蕴含着丰富中国文化内涵的符号学系统，“语象合治”便是对其高度的概括，由此出现的“中性符号学”研究则是对其系统化的探索，所以，中国的符号学研究当前主要（不否认也有其他尝试）还是集中在与汉字的符号构成和表意相关的方面，对于图像的分析也不脱符号之特质。我认为，我们当然可以坚持自己的研究方向和领域，与此同时，了解一下包括法国符号学研究在内的“其他声音”，对于发展我们自己也是有益的。

引用文献：

- 埃诺，安娜 (2019). 符号学问题 (怀宇，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索绪尔，费迪南·德 (1982). 普通语言学教程 (高名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 Biglari, A. (Ed.). (2014). *Entretiens sémiotiques*. Limoges: Lambert-Lucas.
- Coquet, J. - C. (1982). *L'École de Paris*. Paris: Classiques Hachette.
- Houdebine-Gravaud, A. - M. (2009). Interdiscursivité et Intericonicité comme Interprétants en Sémiologie Interprétative. In L. Hébert & L. Guillemette (Eds.), *Intertextualité, Interdiscursivité et Intermédialité*, 371 - 388, Québec: Presses de l'Université Laval.
- Kowzan, T. (1992). *Sémiologie du théâtre*. Paris: Nathan.
- Rey-Debove, J. (1979). *Lexique sémiotique*. Paris: PUF.

作者简介：

怀宇，本名张智庭，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教授（退休），天津外国语大学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法国符号学译者和研究者。

Author:

Huai Yu, whose real name is Zhang Zhiting, is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French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of Nankai University (retired). He is a full-time researcher at the Research Centre for Linguistic Semiotics in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and a translator as well as researcher of French semiotics.

E-mail: zhangshuono3@163.com